

从“仪式性”看纪念馆的“文化展演”空间实践

马萍 潘守永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作为一种独立的博物馆类型,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纪念馆的独特性予以阐述。纪念馆作为国家治理术的重要形式,从“仪式性”视角来看,纪念馆的参观实际上是一场仪式性的文化展演,其仪式内涵与价值便体现在了对国家叙事认同和集体身份的构筑过程中。纪念馆的仪式性特征贯穿于进馆、参观和出馆这一动态过程中。基于仪式理论,纪念馆序厅的设计要具有体验性,突出参观者的参与主体性,而且从仪式情感性来看,纪念馆的叙事文本要有故事性,营造一种高情感卷入度的感性氛围。

关键词:博物馆 纪念馆 仪式 文化展演

中图分类号:G265

文献标识码:A

纪念馆是博物馆的一种类型,是纪念杰出历史人物或重大历史事件的专题博物馆。安廷山在《中国纪念馆概论》一书中称:“西方博物馆一般不把纪念馆看作独立的类型,而是归入历史、科技、艺术等不同类型中去。但是,纪念馆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受到特别重视,一直把纪念馆作为独立类型看待。就我国而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博物馆分类体系就是按照综合类、专门类、纪念类3类进行统计。”^[1]事实上,最近三十年来,随着“热衷于纪念历史性时刻的到来”^[2],西方纪念馆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纪念馆的特殊地位已逐渐取得国际博物馆界的共识。

作为一种独立类型,纪念馆受到了纪念性文化和博物馆文化的双重影响,具有自己明显的特点。有学者从“纪念性”角度去阐释,将古代祠堂看作是中国现代纪念馆的源头^[3];也有学者从“记忆”的视角去理解,认为纪念馆是一类为记忆而生的博物馆,一个存放和展示另类记忆的场所^[4]。本文认为除了“纪念性”和“记忆”外,“仪式性”也是纪念馆区别于其他类型博物馆的显著特点。纪念馆既是一个记忆之场,同时也是一个仪式性空

间。作为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仪式性场所,仪式性广泛地存在于纪念馆中,并被视为实现纪念馆宗旨的必要手段。同时,仪式性也决定了纪念馆集体记忆的形塑方式,并体现于纪念馆独特的展示手法和叙事策略中。

本文将从“仪式性”这一新视角去思考纪念馆。通过对纪念馆仪式性内涵、特征及展示元素的把握、提炼,论述发生在纪念馆空间内的文化展演实践。

一、纪念馆空间的“仪式性”建构

仪式是人类学研究当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关于仪式的概念,学者们从人类学、社会学以及传播学角度作出了各自的阐述。早期的人类学家、宗教学家基本上把仪式置于宗教范畴,它被理解为宗教观念和宗教情感外化的形式,是具有宗教性的实践和行为。自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将仪式研究从宗教扩大到世俗社会领域后,仪式成为一个几乎无所不涉的领域和研究空间。它不仅指宗教程序、节日庆典的展示等制度性行为,还包括有意识形态传播、情感融合、身份认同等功能的行为。摩尔(Moore)与梅耶霍夫

收稿日期 2016-02-14

作者简介 马萍(1986—),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化遗产和博物馆。

潘守永(1966—),男,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新

(Myerhoff)称：“越是到现在，仪式的表述范围就越大，分类形式也越来越细致，社会各个方面和领域都有形态各异的仪式表演和展示。包括诸如宗教的仪式、世俗的仪式、世俗融于宗教的庆典、仪式与节庆、政治性仪式、市民的礼仪、私人仪式和集体仪式、旨在造反的活动与旨在集结的活动、参展的表演与仪式的表演、体育运动的仪式活动、季节性活动、节假日仪式等等。”^[5]可见，今天的仪式已成为一个涵盖面很宽的概念，尽管仪式研究看起来是一个从内涵到外延都不易框定的巨大话语系统，但归根结底，仪式是付诸于实践的一种行为。它是一种具有固定程式化的行为表现形式，并且被作为一个特定行为和社会实践来看待。象征性、表演性、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和功能性是理解仪式的核心要素。

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指出，“尽管在当代社会中，仪式似乎离人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但其实看似古老的类宗教仪式从来没有退出现代国家的舞台”^[6]。因为仪式具有凝聚社会团结、强化集体力量的基本功能，它包裹着政治行动与权力，所以仪式化成为东西方各个国家处理政府治理术的重要方式。“在现代民族国家里，控制着社区权利的政治势力往往会利用各种仪式，或是仪式性的建构(特定的建筑和具有特点历史意义的场所)来使他们的权威获得合法性。”^[7]纪念馆，就是这样一类把历史上发生的特定的、被认为有意义的事件与过程进行神圣化，以期人们对之永恒铭记的仪式性场所。

事实上，博物馆的第一次大规模发展就是伴随着19世纪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建立。作为任何社会不可或缺的理想场所和空间，博物馆是政府治理术的重要工具、载体。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中将博物馆与监狱并置。他认为虽然博物馆与监狱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治理术，但它们却具有相同的效力与目的，即以一种修辞手法将人们融入到国家权力的进程中。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继承了福柯的思想，他将博物馆称为是与支配性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展示综合体”的一部分，但与“惩戒性机构”不同，博物馆“致力于组织自愿进行自我约束的公民的文化性技术”^[8]。简而言之，博物馆就是国家将思想观念内置于公民头脑中的工具，并承担组织物件观看的特定方式及主题的特定形态。

了极大的扩展。博物馆娱乐性的强调，及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露天博物馆等新型形态博物馆的产生，都使得博物馆的内涵更加多元化。今天，尽管所有的博物馆都还具有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已不再是驱动博物馆建设的唯一性因素。对于很多博物馆而言，促进社区可持续性发展，丰富人们的文化休闲生活，发展促进旅游业都已成为博物馆建设的重要动力。然而，对于纪念馆来说，承担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窗口仍然是其主要功能，因此，尽管所有的博物馆都有意识形态，但唯有纪念馆是完全服务于意识形态的。据统计，“在我国，80%以上的纪念馆都是纪念近、现代革命史上重大事件或杰出人物的革命纪念馆”^[9]。这当中所纪念的人或事件多是国家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国民性和国家认同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材料。历史记忆是种族、宗教集团、国家等组织内部对其成员传输的历史知识，这些知识对于实现内部团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成为我国纪念馆最主要的任务。

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和国族崇拜的主要场所，笔者认为纪念馆是当今中国社会仪式性建构的重要场域。在这一空间内蕴含着教化与被教化、促成认同与达到认同的双向行动。而在这一具有固定程式化的行为表现形式下，既展现了流动的国家话语，也体现了纪念馆仪式化的内涵和价值所在——对国家叙事的认同和集体身份的构筑。尽管在这一仪式性的文化展演中，国家权力主体或许并不出现、表现在前台，但它却通过一系列的展览技术和叙说手段实现了民族国家记忆的再生产。

二、纪念馆参观过程中的“仪式性”特征

范可曾对纪念馆的仪式性予以形象化描述：“纪念的事件或人物好比强而有力的神圣象征，它们……组织、指挥并持续不断地激起有关社区、国家与民族的集体理想，唤起公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爱国主义精神，为国家发展和认同提供精神动力。”^[10]作为把历史上发生的特定的、有意义的事件与过程进行神圣化建构的场所，纪念馆内仪式性的理解需以动态的方式贯穿于纪念馆的参观过程中，可以说，纪念馆的参观过程实则就是一场仪式性的文化展演实践。

在仪式研究理论中，维克托·特纳(Victor Turner)的“阈限说”可谓是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分析框架。他认为，仪式意味着人从一种状态向

另一种状态转化的过渡阶段、中间状态,并通过将仪式分为“前阈限”、“阈限中”和“阈限后”三个阶段予以分析。接下来,本文就将参考特纳的仪式理论范式,将纪念馆的仪式性特征放置于进馆、参观和出馆这一动态过程中予以提出、讨论。

(一)进入纪念馆——“阈限性”时空的开启

特纳认为,无论是戏剧还是电影,或是参观艺术展览等现代活动,都有阈限性的方面。因为这些文化情景可以打开一个空间,在那里人们可以从日常生活的实际烦扰和社会关系中跳出,并以不一样的思想和感情来观看自身和他们的世界^[11]。“阈限”是特纳继承了涂尔干“神圣/世俗”二元对立中那些发生在神圣语境中的中介状态下发展起来的观念。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认为对它的理解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进行,他指出,“从世俗的经验来看,时空是均质的,但是对于宗教徒而言时空并不是均质的。宗教徒能够体验到空间的中断,并且能够走进这种中断之中。进入纪念馆阶段实际就是这样一种走进中断的过程”^[12]。

福柯曾将教堂与博物馆并称为神圣化的异质空间。“于其中,世俗的、现代主义式的前进时间观被区分于外,人们经验着非常不同的时间感。”^[13]就纪念馆而言,纪念馆具有独特的时空观。它当中所保存、展示的纪念人物事迹,历史事件都不是发生在观众经历事件当下的体验,而是通过符号、文本及物件等重新建构,并经由参观者想象、移情等作用产生的虚拟事件时空体验。这样一种特意营造的时间与空间,迥异于纪念馆的外在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纪念馆被塑造成了一个“神圣空间”,而参观者进入纪念馆的行为就恰好处在“阈限性”时空开启的阶段。由此开始,观众将展开一段神圣的爱国主义朝圣之旅。

(二)纪念馆参观——“文化展演”的空间实践

特纳将阈限定义为仪式中最核心的阶段,并使用“社会剧”的概念来强调这一中介阶段所赋有的天然表演性质与特征。卡罗尔·邓肯(Carol Duncan)指出:“任何一种仪式场所都是为某种事情的上演而预备。它是一种为表演而设计的地方。”^[14]作为保存、展示社区、地方、国家记忆的剧场,纪念馆的参观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含有天然表演性质的文化展演。这当中,纪念馆扮演了导演的角色,不仅提供叙事剧本,还提供一套包括空间、色彩、光线、物品、影像等前后相继、精心安排的舞台设施;而参观者则扮演了演员角色。上文已述,纪念馆的仪式性是体现在对国家叙事的

认同和集体身份的构筑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曾说:“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因此,集体记忆的认同取决于特定的个人在何种程度上承认它,而它的强大与否更取决于它在集体成员意识中的活跃程度及它如何促成集体成员的思考和行动。”^[15]故在分析纪念馆的文化展演时,参观者的主体性不容忽视。

作为演员,参观者们不仅感同身受,表达情感,同时还自主选择“解码”文化要素,形成自己的认知和观点,与导演一起参与到文化意义的再生产中。邓肯曾形象地形容他们“总是会在某种程度上不断地误读、搅乱或抗拒博物馆线索,或者根据自身的一切历史和心理意外,有意识、无意识地主动发明自己的节目”^[16]。然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演员的表演并非漫无目的。虽然他们在行动与观念上具有主体性,但终究还是在社会、心理和文化上围绕着纪念馆仪式演出而被精心安排、挑选的个体。因此,就中国纪念馆而言,虽然参观者们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发明自己的节目,但是这样的发明始终是处于对“爱国主义”的前设判断中,摆脱不了话语权利的各种影响。作为导演,纪念馆具有操控全局的作用^[17]。所以,当我们在理解发生在纪念馆这一记忆剧场内的表演时,首先应该明确这其实是一场通过话语而形成的文化展演,国家处于主导地位,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个体的能动性。当然,个体的能动性是建立在将集体记忆的叙事框架、解释、定义的结论和意义内在化的基础之上的。

(三)离开纪念馆——情感伴随“认知结构”的更新

特纳说:“通过仪式(Rites of Passage),参与者以反思的方式对于原先结构重新注入活力。”^[18]仪式经验被认为是有目标和结局的。它被视为一种转变,通过牺牲、苦难或启蒙,授予或更新人的身份,亦或净化、重建自我或世界秩序。发生在纪念馆内的“通过仪式”同样会产生这样一种认知结构的更新。邓肯称:“观众在离开纪念馆、美术馆时会带有一种启蒙的感觉,或者是一种精神上被滋养、更新的感觉。”^[19]詹妮·弗汉森-格吕克利希(Jennifer Hansen-Glucklich)也认为:“美国大屠杀纪念馆(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具有这样一种力量,通过仪式化的参观体验后,观众会对

历史事件有了更新性的认识、反思。”^[20]他进一步指出,这种认识是基于不同纪念馆采取的不同叙事方式及各国对待历史记忆的不同态度综合形成的。他对比了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和以色列亚德·瓦谢姆(Yad Vashem)纪念馆,指出两个馆通过不同的时空安排、展品展项布置、叙事策略运用,形成了观展后参观者们不同的认知体系。如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强化了观展后参观者对美国公民价值中民主、宗教宽容的认同;而亚德·瓦谢姆纪念馆则固化了参观者对以色列新建国家合法性的认同。

事实上,通过仪式参与者不仅会对原先的结构重新注入活力,同时,这种认知的更新也是伴随着情感的升华而产生的。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mith)认为:“人们去博物馆或遗产地,往往并不仅仅是为了去获取知识,而是来调整和经营他们的情感。即人们是去表达或感受情感,或在某个他们认为具有特别的历史或文化叙事的博物馆或遗产地进行感情投资”^[21]。现代科学研究表明,情感不仅在促进理性判断方面很重要,在促进认知和记忆方面也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早期的涂尔干,还是后期的大卫·科泽(David I. Kertzer),学者们都认为,仪式之所以比信念在维护政权或政治组织上更有效果,就是因为通过仪式过程中实践着相同的程式行为,参与者们可以共享彼此相同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对于产生对国家的忠诚感和认同感至关重要。就纪念馆而言,当参观者们离开纪念馆时,脑海中形成的对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等爱国主义化历史记忆的再认识其实就是伴随着参观过程中愤怒感、自豪感、成就感等一系列情感的唤起、迸发而产生、强化的。因此,情感无疑是参与者在纪念馆这一仪式性场所内,通过仪式后认知结构更新的催化剂和必要组成部分。

三、从仪式理论视角解读纪念馆展示策略的优化

上文系统论述了纪念馆的仪式性内涵和特征。事实上,从仪式性视角去理解纪念馆不仅仅是希望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去挖掘、阐释纪念馆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尝试引入、借鉴仪式理论,对纪念馆独特的展示方式进行解读和优化。因此,本文的落脚点也在于如何从仪式性文化展演看纪念馆展示的新方向。

(一)从仪式阈限性看纪念馆序厅设计的体验性

阈限理论强调从前阈限到阈限中这一过渡过程包含了一系列象征意义的行为,表现在个人或群体从原处境、社会结构先前的固定位置或者文化状态中分离出去。在纪念馆参观的整个空间流线中,序厅恰好处在这样一个神圣和世俗的分隔带上,对仪式参与者起到了重要的文化状态分离作用。因为步入序厅,标志着参观者正式开始进入由纪念馆营造的特殊时空中。所以,序厅的设计对于纪念馆参观仪式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目前,国内大多数的序厅设计主要是通过空间布置安排、灯光、色彩营造来实现内、外环境的分离。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就将前厅设计为一段向下的台阶,当观众沿着阶梯向下,缓缓步入狭窄的黑暗空间时,压抑、向下的空间布局可以使人顿时从室外的喧嚣感中瞬间安静下来。这样的设计可以有效地收敛感情,为接下来的参观铺垫,创造情感基础。然而,这种感观及情绪上的转变是否就是特纳所强调的过渡过程中一系列象征意义的行为转变?笔者认为并不是。这其实是一种通过调动观众视觉、触觉,甚至是嗅觉,来让他们想象进入一种可被视觉感知的历史空间,带来感观上的身临其境感及情绪上的转变,而这样的转变并不是他们从原有文化状态中分离出来的表现。

那么,什么样的展示手段可以有效地将参观者从原先社会结构的固定位置或文化状态中分离出来,迅速进入仪式的阈限状态?在序厅设计中加入代入式体验元素十分关键。代入式体验强调参观者身份的转变,旨在通过体验,实现参观者身份由纪念馆观众、历史评论者到历史事件当事人的转化。这样一种转化相比之前情绪上的转变,更符合特纳的定义。因为它使得参观者彻底脱离了原社会结构对身份、地位的束缚,以平等的、历史见证者的姿态真正进入到历史环境之中。

当前,国外很多纪念馆在序厅设计中都已融入了这样的代入式体验元素。如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将空间设计成在进入主展厅前,参观者需要先搭乘电梯。乘电梯时,每位观众都会收到一本受难者的护照,护照里记载着一则真实的故事。而当电梯门关闭时,电梯里的电视又会播放纳粹广播号令纪录片。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观众宛如化身受难者,进入集中营开始一场浩劫之旅。再如柏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Jewish Museum Ber-

lin)也巧妙地将入口设计为三段不同意义的通道,分别象征着流放、屠杀和延续,通过让参观者自主选择参观路线来实现他们身份的置换,让他们可以设身处地去感受、体验当时犹太人面对屠杀时的艰难选择。

(二)从仪式主体性看纪念馆展览设计的互动性

纪念馆的参观过程中实际上是一场通过话语而形成的文化展演。这其中,作为演员,参观者的主体性不容忽视。观众们不是被动地观看文化表演,相反,他们可以自主选择“解码”文化要素,主动参与展览意义的解读。因此,在纪念馆的展览研究中,不仅要强调知识的权威性建构和观众的解读需要,更应该将研究关注点落在两者的互动之中。如何在展览设计中体现观众的主体性,潘峰指出,“互动就是一种与观众主体性的协商,是在知识教化与自我体验实践中,架起一道可以逾越的桥梁”^[22]。

今天,互动理念已成为博物馆界的共识,互动方式也丰富多彩。各大纪念馆不仅根据展览主题,研究设计互动体验展览装置,还整合展览资源,开展以专家讲座、互动实践活动为主的一系列活动,以加强与观众的交流。尤其是随着多媒体数字技术,如4D影院、全息影像等技术的发展,更为纪念馆互动性展览装置的设置提供了技术上的支撑。许多价格高昂的互动设施被广泛运用于纪念馆的场景模拟中,甚至新媒体已几乎成为了互动的代名词。然而,根据纪念馆文化展演的实践内涵,我们知道一个展览互动性设计的好坏,并不在于使用的技术有多高端,而更在于通过互动,观众的主体性能否予以体现。事实上,很多好的互动理念不仅操作简单、节约成本,而且可以很好地发挥观众的主体性意识,通过与纪念馆的双向交流,实现观众的自主思考和反思。

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National September 11 Memorial & Museum,以下简称9·11纪念馆)就是一个将互动理念成功地贯穿于整个展览设计过程中的展馆。在项目策划之初,9·11纪念馆就邀请了很多社区代表参与到展览的前期讨论之中。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这是因为他们需要了解未来的参观者到底希望看到一个怎样的展览。可见,在记忆剧场打造初期,未来观众的主体性就已经开始体现,他们同导演一起,通过互动交流,共同参与剧本的编写。除此之外,在建成后的展厅当中也设计了很多互动环节。譬如,在

展览最后开辟了一个观众留言区,但与传统观众留言区内设置留言本、留言墙不同,9·11纪念馆鼓励并邀请参观者将自己的观后感或是在9·11时期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通过展馆提供的录音机以口述形式记录下来。工作人员会将这些语音口述史收集、保存起来,并通过挑选,定期添加到展览中的语音展厅中进行播放。由此,个体记忆通过纪念馆公共平台的传播,被更多的观众了解,而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可见,这样的互动设置真正将纪念馆打成一个舞台,于其中,多元化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交流、融合,并共同内嵌到圣神记忆空间的缔造之中。

(三)从仪式情感性看纪念馆叙事文本的故事性

上文已述,情感是实现仪式目标及结局的催化剂和必要的组成部分。仪式参与者之所以能够通过仪式,对于原先认知结构重新注入活力,是因为在这一更新过程中情感的升华必不可少。正因为情感、情绪的唤起在仪式体验中十分重要,所以作为仪式性场所,纪念馆的展示策略也区别于传统博物馆理性框架的搭建,而更重视营造一种高情感卷入度的感性氛围。因为参观者对国家的认同感及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发都是伴随着参观过程中愤怒感、自豪感、伤痛感、成就感等一系列情感的唤起和迸发而产生的。

但什么样的情绪可以真正帮助参观者实现仪式经验目标?兰兹伯格·艾莉森(Landsberg Alison)通过对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分析,将观众的情绪反应分为“移情作用”(empathy)和“同理心”(sympathy)两种。他指出,“移情”是透过对叙事观点的认同,引发与当事人同悲同喜的感受,而“同理心”则是一种类似感同身受,并产生积极怜悯与认同的情感。他称“场景模拟等展示手段虽然也是以唤醒观众情感为根本出发点,但它带给观众更多的是一种身临其境感,这与感同身受、关切,并且想改变其悲惨命运之同理心有所不同。展览只有激发了观众的同理心,才能真正将他们的情绪与感受转化为积极行动的力量”^[23]。

艾莉森认为在激发观众同理心方面,故事性的叙事方式无疑最为有效。随着宏大历史在后现代思潮冲击下的解体,大写、一元的历史逐渐被复数形态的各种小写历史所替代。这样历史观的转变也开始影响博物馆、纪念馆的叙事^[24]。今天,故事性的叙说方式已成为西方纪念馆的主流。因为故事往往都是多元、小写、感性的历史视角,所

以相较于宏大历史叙说下内容的高导向性及教条性,它可以更好地与观众自我记忆相连接,形成一种与自我经验、经历的共鸣,由此激发、诱导观众产生感同身受的情绪。尤其对于青少年而言,正确情绪的唤起对于他们培养健康的历史观更加必要。

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就专门针对青少年,设置了一个“记得孩童——丹尼尔的故事”(Remember the Children Daneil's Story)常设展。在这个展览里,没有令人怵目惊心的照片及逼真的历史场景模拟,取而代之的是生活在德国犹太儿童丹尼尔房间的陈列摆设复原。通过丹尼尔的日记,以他的视角叙述了当初他是如何与家人分离,被送达集中营及在集中营里发生的一切,将一个个小故事串联起来勾勒、描绘了战争的残酷。根据设置在展览结尾处的留言本,我们可以看出丹尼尔的故事成功感动了很多青少年,并形成共鸣。很多人留言将丹尼尔称为他们一生的挚友,鼓励他、同情他,希望他的故事在自己身上不要重演。

四、结语

纪念馆,作为在现代民族国家里被仪式性建构,渗透着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场所,它的参观本身也可以理解为一场仪式性的文化展演。其浅层结构意味着一台通过前后相继的空间和物品摆放、光线色彩及建筑细节构建而成,并融合了感观、触觉、记忆和意识等的舞台剧;深层结构则是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再现。构筑具有民族国家群体意义的集体身份,强化认同及为国家提供权利象征或合法性依据是中国当代纪念馆的仪式性内涵和核心价值。

近三十年来,随着纪念馆建设速度的不断加快,它已成为中国文博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今天,承担了培育、凝聚、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崇高历史使命的中国纪念馆如何发挥自身优势,以更开阔的国际视野、更开放的文化理念,融入到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合作中,将自身蕴含的优秀民族精神传递给全国、全世界,需要有更多的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纪念馆这一文化机构进行解读^[25]。本文尝试将仪式理论引入纪念馆研究当中,通过对纪念馆仪式性内涵和特征的提出,梳理及对其特征在展览设计中的解读,认为从仪式性视角去思考纪念馆内的文化展演实践,不仅可以从理论层面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纪念馆区别与其他博物馆类型的独特性,同时也可以从实践层面,更好地指导中国未来纪念馆的展览设

计等实践性工作。

- [1]安廷山:《中国纪念馆概论》,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 [2][法]皮埃尔·诺拉主编,黄艳红等译:《记忆之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0页。
- [3]黄春雨:《中国古代纪念馆溯源》,《中国博物馆》1989年第4期。
- [4]俞文君:《纪念馆群体历史记忆建构的统一、矛盾与融合》,《中国博物馆》2013年第3期。
- [5]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3页。
- [6]Edward Shils, *Ritual and Crisi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1966, p.251.
- [7][美]大卫·科泽著,王海洲译:《仪式、政治与权力》,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0页。
- [8]Tony Bennett,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5, pp.14—18.
- [9]张秋兵:《中国纪念馆馆议》,江苏省博物馆学会编《区域特色与中小型博物馆——江苏省博物馆学会2010学术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
- [10]范可:《灾难的仪式意义与历史记忆》,《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 [11][18][英]维克托·特纳著,黄剑波、刘博赞译:《仪式的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5—96、32—35页。
- [12][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著、王建光译:《神圣与世俗》,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2—13页。
- [13]Michel Foucault, *Of Other Space: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 *Diacritics* 16 (Spring 1986), pp.22—23.
- [14][16][19][美]卡罗尔·邓肯著,王文婷译:《仪式的文明化:内观公共艺术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网站[EB/OL] http://museum.cafa.com.cn/cn/Other/OtherDetails_-_qt_169.
- [15][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25页。
- [17][22]潘峰:《“同根同源”的文化展演》,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 [20]Jennifer Hansen-Glucklich, *Holocaust Memory Re-framed—Museums and the Challenges of Representati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113—115.
- [21]劳拉简·史密斯、路芳:《游客情感与遗产制造》,《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 [23]Landsberg Alison, *America, the Holocaust, and the Mass Culture of Memory: Toward a Radical Politics of Empathy*, *New German Critique*, 1997, pp.63—78.
- [24]彭刚:《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理论视野下的

记忆转向》，《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
[25]中国博物馆协会纪念馆专业委员会：《纪念类博物馆

国际化问题研究高峰论坛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9页。

(责任编辑：黄 洋；校对：王 霞)

“Rituality” and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Performances in Memorial Museums

MA Ping PAN Shou-yong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e memorial museum as a special museum type has been studied by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oward its uniqueness. It is an important form of government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tuality”, the visiting process to the memorial museum is by nature a cultural performance, the ritual connotation and value of which lie i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national narrativ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llective identity. The rituality of the memorial museum runs through the entire visiting process from entering, through visiting to exiting. Based on the ritual theory, the design of the exhibition entrance should highlight the experience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visitors. Furthermore, the narrative text of the exhibition should be story oriented, and the exhibition should create an atmosphere with high emotional involvements.

Key words: museum; memorial museum; rituality; cultural performance

2017年3月“南博讲坛”——李昌钰刑侦科学博物馆

2017年3月21日，“南博讲坛”请来重量级嘉宾——被称为“当代福尔摩斯”的美籍华人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博士，李昌钰博士与400多名观众分享了他的人生经验：“我这一辈子实际上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使不可能成为可能。”2个小时的讲座里，李博士边讲边提问，风趣幽默，妙语连珠，还向回答问题的观众赠送“警徽”和签名卡片。

李昌钰博士作为全美第一位出任州级警界最高职位的华裔首长，在任职期间，他破获了数百起震惊全球的重案、大案，由他侦办过的许多案件，都成为国际法庭科学界与警界的教学范例，先后荣获八百多个奖牌。这次讲座他为大家讲述了他所参与的肯尼迪总统被杀案、尼克松“水门事件”、克林顿“桃色案”、“9·11”事件、中国台湾“3·19”枪

击案、辛普森杀妻案等。

2000年左右，李昌钰博士回到了祖国，与国内众多高校、机构进行合作并授课。2016年，他在家乡江苏如皋开创了全球首家刑侦科学类博物馆——李昌钰刑侦科学博物馆，将自己毕生刑侦鉴识科学成果放在家乡如皋集中展示，博物馆运用高科技、多媒体手段还原的重要案件，为全球刑侦鉴识技术研讨提供参考。未来，他还将以李昌钰刑侦科学博物馆为平台，建立刑侦鉴识科学研究会，定期组织刑侦鉴识科学的研讨与合作交流，旨在为刑侦鉴识领域的科研发展和成果孵化提供优质土壤，同时为专业刑侦鉴识人才的培养提供重要支撑，从而有力推动国内外刑侦鉴识科学的深入发展，提高司法公信力。